

闺蜜向我抱怨, 五岁的儿子不肯认字、不会做 20 以内的加减法、对英语没有兴趣、弹琴也要每天逼着, 怎么就那么不爱学习? 我反问她, 他不是很擅长拼装乐高玩具、擅长轮滑、对恐龙相关的知识头头是道。闺蜜说,那有什么用? 入学考试又不考虑恐龙的种类? 我不禁感慨, 什么时候开始, 学习也有了三六九等?

女儿生病, 没去幼儿园。吃完早饭后, 一个人专注地坐在书架旁看儿童绘本。我们家里的绘本不算多。因为四岁半之前, 女儿对绘本的兴趣不大, 确切地说是对自己看绘本的兴趣不大。一开始, 我也疑惑她为什么不爱看。后来我发现, 她更喜欢我给她讲绘本, 喜欢生动的语音语调。我意识到, 这个成长阶段, 我的女儿可能对于声音的兴趣大于图像。于是, 我给她下载各种故事, 鼓励她用声音和肢体动作扮演故事里的角色。再后来, 仿佛一夜之间, 女儿开始对认字感兴趣。那些曾经被她冷落的绘本, 重新得到了宠爱。每个清晨和夜晚, 她会到小书架上找来感兴趣的绘本, 把以前忽略的文字一个个念出来。对于自己可以讲出那些曾经只听妈妈讲的故事, 她似乎很有成就感。她依然享受声音的魅力, 不同的是, 她会享受自己的声音, 并试图通过给大人讲故事的方式分享她的成就感。这件令她享受的事, 也刺激她想认识更多的字。在她看来, 认字是

呵护孩子学习的本能

姚霏

顺理成章的事, 因为她想讲更多故事。每次, 她看书时的专注、朗读时的得意, 都让我禁不住感动。那是人类对学习最原始的渴望。学习本领然后享受成长, 这原本不就是人类的本能吗?

反观当下的幼儿教育, 学习变成一件功利的事。我们攀比着孩子的成绩, 却不懂得欣赏孩子的成长。其实, 学习哪有什么贵贱之分? 在幼儿园阶段, 多做几道 20 以内的加减法, 并不比多认知几种恐龙要高贵; 听到抒情的旋律会翩翩起舞、听到动感的节奏会拍手踱步, 可能比机械地在黑板上数着敲打几下更动人; 花大价钱学习某种看上去很美的绘画, 不如鼓励孩子涂鸦自己身边的事物。即使技法拙劣, 甚至“不堪入目”, 但孩子懂得了世间万物和内心感受可以通过说话、唱歌、绘画等一切形式表达。

伴随成长, 知识结构终会日渐丰满, 技能技巧终将日臻成熟, 反而是一颗热爱学习的心, 将变得弥足珍贵。作为家长的我们, 最应该做的是适时地引导和保护孩子对于学习的热情。即使将来, 难免为了考试升学而学习, 我也会告诉女儿, 这种学习, 和你小时候为了讲出喜爱的故事而认字一样, 是成长过程中顺理成章的事。而一个从小享受学习、在学习中中获得过成就感的孩子, 应该不会拒绝任何类型的学习吧。

三十年前的国际新闻研究生

钱绍昌

今年春节前, 我接到一个电话, 自称张林超, 说是我 30 年前的国际新闻研究生。30 年前的研究生! 我哪里还记得名字。他说他们同班四人打算假上海国际中心邀请我们夫妇二人参加晚宴。30 年前的学生邀请我们聚会, 我自然乐意参加。他们十分热情, 担任某出版社社长的韩玉亲自驾车接送我们夫妇。席间我的老学生们频频举杯敬酒, 祝先生和师母健康长寿, 使我们甚为感动。

过去的新闻记者要采访外宾时就得带上一个翻译。语言一经翻译, 往往容易出错或是词不达意, 闹出笑话。我记得 1965 年, 当时我担任瑞金医院烧伤科主任, 1963 年接上断肢的陈中伟陪同一位美国烧伤专家前来瑞金医院参观, 由我接待。他们还带着一名翻译。外宾说到一些专业名词的时候, 例如烧伤的焦痂(eschar)、自体器官(此处指皮肤)移植 autograft)、同种器官移植(homograft)、异种器官移植(heterograft)等专业名词, 翻译有困难, 我就代为译出来, 当时翻译不以为忤, 并不觉得丢脸, 因为任何翻译不可能精通所有专业的词汇。

后来上海外国语学院(当时尚未改为大学)要建立国际新闻系, 培养一批(第一批是 7 名)既熟悉新闻业务又精通英语的研究生, 希望他们都能熟练地用英语进行采访和用英语报道。这个任务就落到了钱缙蕃和我的头上。钱老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留在大陆的英文报纸的记者, 他曾是英文《密勒氏评论报》和《字林西报》的记者, 所以他是真正的国际新闻专家, 而我完全是半路出家, 根本没有搞过什么国际新闻, 也不懂什么是国际新闻。也许因为我是个医生, 知识面比一般的英语老师广一些, 所以选中了我。跟随着钱老, 我们这个“双钱牌”勉强挑起了这个担子。另外有两名年轻的讲师协助。反正有钱老做靠山, 我也就勉为其难。上新闻课完全用英语讲课, 这就算是“国际新闻”了。为了熟悉国际新闻业务, 我从图书馆借来了三本厚厚的英文新闻书, 拼命往脑袋里灌, 书里看来的就在课堂上讲, 十足的现实现销。谁知过了不到一年钱老不幸仙逝, 他去世时才 74 岁。他一走, 我失去了靠山, 落得个犹如曹孟德所云“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 无枝可依”, 接着两名讲师都出国了, 丢下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没有人能帮忙。在困境中, 我只好硬着头皮独自拼命撑下去, 我一个人竟开了三门课, 都是用英文讲课。好在我当时还刚满 60 岁, 尚有精力。在我们师生的共同努力下, 这 7 名研究生后来总算毕业了。他们念得好累, 但他们想不到的是我比他们更累。不过学生们对我的讲课比较满意, 因为我常在讲课中常穿插一些外语笑话提高大家的兴趣。

如今当年的这批研究生早已独立成才, 均已担任领导干部或私营企业主。特别令我感动的是, 远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主丁讯为了探望我这个多年前的老师, 特地从苏州赶来参加宴请。师生之谊实在情深。

后来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国际新闻学院, 院长就是我当年的学生郭可, 他已经当了多年的教授了。学院培养了许多国际新闻专家, 在全国的新闻机构担任要职。如今, 国际新闻已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一门重要的专业, 笔者当年的努力也算有一点成果了。

大连有山有海的地方。山, 不是崇山峻岭, 却也层峦叠嶂, 谷幽林深。海, 却是真正浩瀚无际的大洋大海。在这山海之间, 自然少不了山珍与海味。

自来了大连, 饮食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 肉吃得少了, 海产吃得多了。随便哪个菜场、超市或者路边夜市, 都有海鲜摊一溜排开, 在海水里养着各式各样的鱼虾蟹贝, 价钱也便宜得惊人。内地作为奢侈品的海鲜, 在这里都是饭桌上的家常。鲍鱼、鲑鱼、鲈鱼、牡蛎、皮皮虾、竹节虾、黄金贝……从此尝试了海鲜的各种做法, 炒、煮、蒸、烤, 怎么做都好吃。

有一次十元钱买了三斤扇贝, 得意洋洋在朋友圈晒晒, 立刻有人跟我说, 还买到过十元八斤的。

还有一次买到一条二斤七两的大鲈鱼, 几乎有炒菜锅盖那么大。放进炒菜锅清蒸, 还有一小截尾

伙, 拉着那么多车跑遍祖国的城乡大地, 我心中对火车司机佩服得五体投地; 一路上的美景任凭他观赏, 多么自豪! 司炉工把乌黑的煤炭用铁锹送进火

西站看火车

俞鸿虎

红的炉膛。不及细看, “刺啦” 只见一道白色蒸汽向我们袭来, 顿时白茫茫一片啥都看不见了。蒸汽散去再看, 原来是一列货车, 有的车上装载着木头; 有的装载着拖拉机, 闷罐车里押车人站在门边打量着挡子外面的人们, 我们似乎成为他眼中的风景。我们数着过去的车厢, 争论不休。最后一节车厢特别短, 是列车长呆的地方, 他站在栏杆后, 手里拿着绿色小旗与道口值班员手里的绿色小旗互相摇动示意。

我们上到铁路桥, 行人在桥上狭窄的水泥板上匆匆而行, 骑车人交会, 双方都必须侧着身子才能通过。望着桥下黑臭的苏州河, 小火轮拖着一长溜满载货物的驳船, 向黄浦江驶去。有火车呼啸而过, 大桥也随之晃动, 震撼着我

巴露在锅外面进不去。奇怪的是, 那么大的鱼, 肉质还是很肥嫩, 得出结论是鲳鱼要买大的, 吃着过瘾。最方便的是烤海鲜, 买两斤蛭子、蛤蚧、牡蛎之类的贝类回去, 清水冲洗后直接放进烤箱, 开大火烤十几分钟, 看见贝壳开口就熄火, 撒一把胡椒粉, 鲜咸嫩, 真正的原汁原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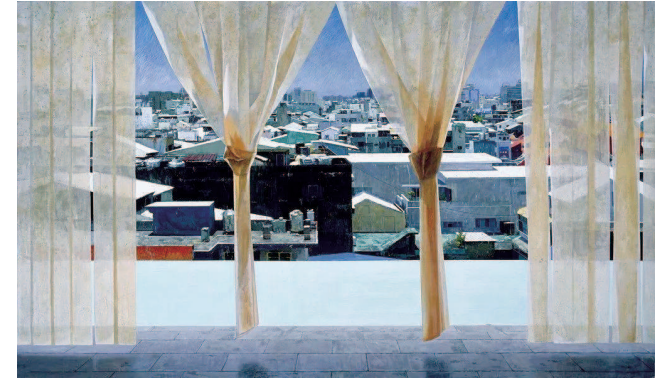
大连的海鲜中最出名的当属海参和海胆了。海胆饱满肥美, 一般用来做刺身或者蒸鸡蛋。哧着舌头细细地品一品, 鲜味中带着一丝甜, 在舌尖可以萦绕许久。

海参却不鲜, 做菜也很难入味, 但我十分喜欢它弹弹的胶状的口感, 用来红烧或炖汤都不错。有的酒店用新鲜海参做刺身, 没有煮过的海参吃起来就像海蜇皮, 韧劲十足, 咬不动, 嚼不烂, 几乎是生吞下肚, 不宜消化, 总觉暴殄天物, 还是葱烧海参更对我胃口。

们的心魄, 我赶紧吩咐弟妹们抓紧栏杆, 客车一阵风似的向北站驶去。

西站候车室里, 几排木头椅子磨得蹭亮, 几个农民伯伯坐在椅子上候车, 身前放着两只空空的箩筐, 一根扁担支在上面, 我猜是卖“绍兴霉干菜”的, 他们搭慢车回去。售票窗口上面是全国铁路里程表, 我从上到下——看过去, 北京到上海竟有那么多车站, 数都数不过来! 心想我啥时候能去北京看看天安门?

如今最小的弟弟已退休两年了, 我的外孙女也上幼儿园了, 每天经过谁家湾铁路道口, 她跟我儿时一样, 也喜欢看火车。



被收藏的风景(油画)

周栋

难忘的电影镜头

任溶溶

《纽约奇谈》, 由几个小故事组成, 串起这些故事的是一件礼服。最后这件礼服到了一个穷钢琴家那里。这钢琴家肥胖(演员是查理斯·劳顿), 穿了这件礼服弹琴很不自在, 这时一位音乐理论家首先脱掉礼服, 观众也随之脱礼服, 钢琴家赶快脱掉不合身材的礼服, 弹奏得出神入化, 大获成功。

这部片子让我异常感动, 念念不忘。也希望这样爱惜人才的人物(不管是什么大家)越多越好。

还有一个电影镜头我也忘不了。那是好莱坞电影《一曲难忘》, 写的是波兰钢琴家肖邦的故事。里面有一个镜头非常感动人, 肖邦正为大家演奏时, 来了俄国贵宾, 肖邦马上离开钢琴, 说了一句: “我不为屠夫演奏。” 盖当时俄国正侵犯波兰也。

大连周围多山, 山上多林, 林里自然多是各种果实。金州的大樱桃、瓦房店的大苹果都很出名, 还有葡萄、黄桃、山楂……各种干果也多, 每年秋季, 在路边摊就可以买到新鲜采摘的松子、榛子、栗子。

去年有朋友去山里玩, 带回来很多栗子。从树上新鲜摘下的, 一颗坏的都没有, 个大饱满, 香甜糯软。朋友豪爽, 一下子送了我们二十斤。于是接下来的两星期中, 我不辞辛苦地用栗子做了各种食物。最简单的是清水煮或蒸, 熟了以后剥壳吃, 又甜又软。还把栗子肉剥出来煮粥、烧菜或者制

大作点心。栗子烧鸡是名菜啊。试过各种吃法后, 觉得最好吃的还是经典的糖炒栗子。栗子和焦糖的香和甜, 那么和谐地融为一体, 在寒冷季节暖身暖心。

东北的土产块头似乎特别大, 见过特大大葱、特大大茄子、特大鸡蛋……山里农家的大公鸡, 一只就有八九斤, 体形比普通鸡大一倍。鸣声嘹亮, 脚爪粗壮, 想来是天天在山里觅食的。看见这样的鸡, 才明

我从小是电影迷, 电影看得多了, 有些镜头会让我经常回想。

这出片子叫



白为什么大家把鸡叫做“跑山”的。

有个老同学来大连, 请他吃经典东北菜铁锅炖, 他回去后念念不忘那份香气扑鼻, 跟我念叨了好几次。其实他不知道, 最好吃的铁锅炖是山里农家用柴火大灶炖出来的。曾跟朋友在阴冷寒风中爬大

黑山, 下山后浑身瑟瑟, 钻进农家菜馆。十几个人在热气腾腾的大铁锅边

围炉而坐, 锅里咕嘟咕嘟翻滚着牛肉、鸡肉、大鹅、白菜、粉条、土豆、贴饼子……一口炖菜下肚, 顿时全身心地熨帖了。山里人的铁锅炖做法非常粗犷, 一大把大葱蒜头花椒大料在锅里爆炒得香气四溢, 再加水和酱油煮红汤, 各种食材都可以放进去“乱炖”, 边炖边捞, 炖得汤浓肉酥, 滋味浓郁。这种热闹喧腾的吃法, 温暖亲切。

这样富饶的水土, 这样奔放的天气, 正是这山珍海味的来处。

一口气, 随即以慷慨激昂的语调宣告着这件对上海百姓而言天大的喜事。

宣布上海解放的声音中还有施燕声。作为电台的一名播音员, 当她望着一列列秩序井然的解放军走向电台, 她欣喜地大叫, 立即冲入播音间开启机器, 向上海各界通报这则令市民们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她手中攥着的 23 字讲稿, 来源于长期隐蔽在国民党新闻界的中共地下党员邹凡扬……

七十年前, 上海解放的那声呐喊从沪西到浦东, 从南京路到苏州河, 如星火般在一片区域、一条条街道、一户户家庭中传递着。在上海的不同角落, 不同的人, 发出了同样的声音。数不尽的“第一声”最终汇聚成了上海人民的心声, 盼望着, 建设红色的新中国。盼望着, 属于人民的新上海。

这天, 海关大楼悬挂出了外滩迎接人民解放军的第一幅标语, 绮云阁升起了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

十日谈

上海解放新气象

责编:徐婉青

宣告胜利第一声

陈克涛

炜搭船来到上海, 组织指示她“潜伏”待命。酷爱歌唱的她曾收获来自田汉、冼星海的掌声, 于是徐炜便和同志们受命组建“上海广播乐团”并在国民党官办“上海电台”坚持进行地下斗争。最激动万分的时刻终于到来, 1949 年 5 月 25 日, 解放军终于挺进上海, 徐炜按照地下党组织指示来到已被占领的国民党电台, 在同志们的配合下, “百灵鸟”清清脆喉, 缓缓走入播音间, 深吸

1949 年 5 月 25 日的凌晨, 对上海市民而言, 注定是永生难忘的。家中的收音机里传出了特定的声音, 它不仅昭示上海胜利解放, 更象征着这座城市即将重获新生。

“我们上海人民解放了! 亲爱的同胞们, 上海人民保安队播音开始! 人民解放军已来到南京路……” 播音员李云森难掩内心澎湃, 看向一旁默契守卫这座电台九年的杨俊, 深感这一天来之不易。1940 年仅 16 岁的杨俊加入新新公司, 当时新新公司装备了上海第一个由中国人创办的广播电台, 后改称“凯旋电台”。就职期间, 杨俊偷偷学习电台使用技巧, 并摸清值守人员班次。九年后, 解放军挺进南京路, 公司地下党上級匆匆赶来交给杨俊一张打字纸, 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 以及军歌《我们的队伍来了》并要求立即使用电台, 向全市广播。杨俊带领的人民保安队随即克服电台经理的阻挠, 并修正了被拨乱的电台频率, 方便这激动人心的消息传递到千家万户。